



Pierre Bourdieu's Ultimate Concern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刘拥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Pierre Bourdieu's Ultimate Concern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刘拥华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 刘拥华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12

ISBN 978 - 7 - 5426 - 3177 - 0

I . 布… II . 刘… III . 布迪厄(1930~2002) — 社会学 — 理论研究 IV . C91 - 095.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1313 号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著 者 / 刘拥华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特约编辑 / 田 波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sh.cn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10 千字

印 张 / 14.75

ISBN 978 - 7 - 5426 - 3177 - 0/C · 334

定价 : 32.00 元

序 言

法兰西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法兰西民族一直保有其独特的自由和高贵的气质。伟大的民族是由伟大的思想家所建构而成的，布迪厄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法国社会学界，布迪厄是雷蒙·阿隆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曾做过阿隆的助手。毫无疑问，选择这样一个开时代风气，具有划时代影响的理论人物作博士论文是需要勇气的。同时，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学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重建进程恰与美国社会学的繁盛同时。因此，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唯美国之马首是瞻，深受美国社会学之影响，而忽视了世界社会学理论谱系中的欧陆传统。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虽然伴随着学术界对布迪厄、福柯、吉登斯等欧陆社会学家思想著述的密切关注而有所变化，但其研究仍然缺少应有的深度。在这一意义上，对 20 世纪晚期独执欧洲社会学之牛耳的布迪厄的理论体系展开系统深入的专题式探究，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建设亦具有重要的意义。拥华博士的论文，在上述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拥华博士看来，就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体系而言，其所追问的依然是一个霍布斯式的秩序问题，即“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这种追问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性的努力，更有政治性的诉求。换言之，如何可能通过对社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会进行的社会学关注，即一种结构性的揭示，来祛除现代社会的迷雾。从而使身处其中的行动者有所警觉、有所意识、有所反思，超出无意识的状态，继而能够以历史理性为武器，反抗种种象征暴力。而我们又知道，这种出发点，无疑与社会学本身的理论主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涂尔干就说，社会学需要在传统主义丧失其支配地位以及理性信念坚定的情形下才可能发生，换言之，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门有关认识论的学科，进而基于这种认识论的断裂，型构其自身的批判立场。不得不说的是，这就是法国的学术传统，法兰西民族的伟大亦在于此。就此而言，布迪厄深深地把握住了社会学的命脉。

认识论的关注，在布迪厄那里，即是对无意识的关注。这就是说，拥华博士的论文是基于对现代社会的无意识层面的分析而展开的。具体而言，无意识是以信念(doxa)的方式而存在而运作的。作为对现代社会所作的一种分析，“信念”则成为现代社会(甚至是整个社会世界的历史)的一个基本面相，或者也可以说，现代社会的某些基本面相是基于种种“信念”之上的。“信念”是对社会世界前反思性的、不由自主的接纳。尤其是对权力关系的解读，更是涉及“信念”概念的内在延伸和扩展。信念，作为对社会世界的前反思性的接纳关系，也即对界限的确认和误认，这里所谓的界限是指人类社会的诸种分类系统和由社会(制度化)的仪式所导致的区分，而权力关系正是在这一确认和误识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这亦即象征权力的意蕴了。这里所展开的是对权力、信念与分类的内在关联的清理，以及基于这一关联对合法性与象征性的阐述。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大量的分类系统，它们并非中立的，而是演变成政治性问题，这一政治性问题也就是象征权力或者说制度性行为的行使和作用问题。象征统治的特殊形式通过分类的集体行为推广开来，而分类行为则产生了有意义的、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别，并因而产生被打上烙印的社会群体和类别。而布迪厄所涉及的教育问题，则可以理解为是对文化和信念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也是对社会世界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比较具体而微

序 言

的分析了。教育生产和再生产了各种分类图式、划分原则、资本分配的等级结构以及对它们的神话式的崇拜和信奉。而在此进行的分析，在布迪厄看来，则构成了政治哲学分析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在这些分析当中，布迪厄引申出了符号暴力、象征权力（符号权力）等概念工具，非常明显的是，这些概念的基础正是在于信念之上，也就是说，倘若没有受众对各种分类图式的“前反思性”的接受，各种权力就无法以象征暴力的形式出现和运作。远远不够的还在于，以上所进行的社会分析并没有涉及“信念”的另外一个尤为关键的领域，也即社会科学场域本身。对社会科学场域“自焚式”的分析，启发了布迪厄反思与实践社会学的出场。社会科学一方面生产着各种各样的信念，同时也生产着对这些信念的信念。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场域，它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同时却又与社会结构进行着隐而不显的“同谋”，因而它是保守式的。值得一提的是，在布迪厄看来，社会科学家们都对自身的“无意识”是最为“无意识”的了。如果是这样，一种反思性观念的出现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这就构成了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出场之路。所谓反思，也就是一种基于对信念反思基础上的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自身的反思。而这些内容，则型构成了布迪厄“政治、科学、理性”分析的一部分。

博士论文的写作，比的是慢功夫，所耗费的时间，远远不止博士三年的学习。拥华博士对布迪厄的研究，就是在“慢功夫”的基础上写作而成的。从2001年拥华跟我读硕士时起，便对社会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2007年博士毕业这六年，他一直倾心于社会理论，几近痴迷的程度。期间，还在吉林大学社会学系组织读书小组，以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硕士为主体，兼及法学、政治学、哲学等专业学子，专门研读布迪厄的著述。记得当时我曾受邀参加过几次他们的读书活动，深深被读书会成员的认真和虔诚所感动。因为在这样一个功利和浮躁的时代，人们习惯了打快拳，以此种方式持久地研读学术基础经典的人毕竟不多见。更难能可贵的是，拥华博士毕业赴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后，置身海派文化的氛围之下，仍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陶醉于布迪厄研究。他仔细对论文予以修改、深化，现在手头上的文稿比博士论文精进不少。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博士论文是 23 万多字，而这本书他删掉了博士论文中的 9 多万字，新写 7 万多字。并将博士论文的结构推倒重来，使得论文的论述更为合理与紧凑。可以说，没有博士毕业后两年时间的修改，这本书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中国知识界自古就有奖掖后学的传统，常用“后生可畏”来形容年轻学子令人惊叹的进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代际传承期望和寄托，更是一种真实的社会事实。窃以为，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前相比，今天的年轻人读书问学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出户牖而知天下事，未曾谋面亦可侃侃对谈。相信拥华一定会置身沪上开放宽容的学术氛围中，在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相关领域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获得更大的学术进步。

田毅鹏

于吉林大学社会学系

目 录

序言	1
引言：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1
第一章 礼物交换：“崇高主题”还是“支配策略”？	3
一、争辩缘起：莫斯学派与布迪厄	3
二、“崇高主题”：礼物交换的社会范式	6
三、从“崇高主题”到“支配策略”：基于时间概念	15
四、宗教神圣性与区隔：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原点	23
第二章 分类图式、信念与政治	28
一、从涂尔干出发：分类与社会世界	28
二、身体政治：心智、习性与默会知识	37
三、重估分类图式的政治性	45
四、终生问题：分类图式与政治的象征性运作	49
第三章 二重性世界与信念(doxa)	54
一、社会世界的二重性	55
二、二重性与 doxa 概念分析	78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三、基于信念：实践感与政治	87
四、实践理性：从规则到策略	92
第四章 二重性世界的象征运作	102
一、作为权力的象征资本	103
二、从象征资本到象征权力	107
三、制度、正式化与权力	112
四、习性、信念与政治运作	117
第五章 身体、合法化与语言	124
一、身体与社会理论	124
二、实践与身体	129
三、实践意识：身体化政治(embodied politics)与合法化	135
四、语言与象征权力	145
第六章 分类、教育与政治哲学	156
一、社会的再生产与政治哲学	156
二、从象征斗争到教育行为	162
三、教育行为与社会再生产	167
第七章 理性的政治前景：迈向解放的社会世界	180
一、作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学	180
二、反思社会学的运作：对象化的对象化与关系主义	189
三、理性、伦理与政治	200
结语 沉默的千言万语	211
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25

引言：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亚历山大曾用充满惊诧的语气说过，除了哲学方面为数极少的几位新自由主义评论家以外，在法语世界中，几乎不存在任何对作为社会理论家的布迪厄的批判性评论，甚至，布迪厄的著作几乎从未得到过讨论。这一状况并没有打消亚历山大本人对布迪厄的批评，反而在滋生着他强烈的批判意识。真实情形却并非如亚历山大所言，在法国这一凡事都需表明立场的国度，布迪厄的立场则过于鲜明而犀利，从而在不经意间演变成一个颇有争议的符号。尤其是随着 1979 年《区隔》一书的出版，非议之词随之铺天盖地。然而，试图以还原论与决定论的缺陷而将布迪厄归之于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做法，亚历山大的分析并不充分。因为在对象征涵义的解读上，布迪厄并没有与新马克思主义走到一起^[1]。正如布迪厄称谓他的研究为唯物主义人类学这个概念一般，他试图与各种新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其最为显著的表现就体现在他沿循维特根斯坦的思路，追问

[1] 布迪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还原论批判的种子来源于他在卡比尔人那里所观察到的系列象征活动，他认识到，这些系列的象征仪式活动对于群体生活的维系以及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其意义并不亚于经济基础。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要对经济活动与象征活动予以区分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把符号活动重新理论化为一种权力的形式，一种资本的类型，它可以用以产生社会的优越性，并实施社会控制”。参看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9 页。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遵循一种规则到底意味着什么”，从而，试图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重新迈向一种政治哲学与知识政治的解放图景。而这种政治哲学与知识政治的诉求，可以从布迪厄对分类图式的政治运作的角度来予以阐释，因为，作为知识工具的分类图式却充当了政治合法化的手段。这便是一种“无意识”，一种对历史的无意识、一种对历史深刻的忘却。正是从这一“无意识”出发，本研究试图在逻辑上细致化布迪厄的理论分析。而此一问题，我们称之为“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第一章

礼物交换：“崇高主题”还是“支配策略”？

一、争辩缘起：莫斯学派^[1]与布迪厄

对礼物交换的理论化，尤其是由莫斯和列维-斯特劳斯所开创的礼物交换模式，构成了社会学消解社会与个人紧张关系的切入口，亦是我们追问社会/个人何以可能的基本线索，因而，得到了社会学与人类学持久的关注。反过来，对礼物的持久关注，亦建构出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经久不衰的想象力。在莫斯所奠定的经典传统中，对礼物的关注是基于“社会”何以持存以及建构团结纽带的维度展开的，这种礼物范式亦是在涂尔干“深度自我”的意义上进行的^[2]，“深度自我”强烈地体现出某种自由与义务的完美结合。而自由与义务的完美结合亦就是莫斯意义上“总体的人”

[1] 需要说明的是，在学术史当中并不存在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莫斯学派”，我们一般将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理论学派称之为“社会学年鉴学派”、“社会学学派”或者“社会学派”，莫斯是其中的核心成员。我们这里的“莫斯学派”，主要是指围绕莫斯的“礼物交换模式”而在法国形成的“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功利主义运动”，这一运动与布迪厄关系大焉。

[2] 李猛：“论抽象社会”，《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homme total)的形象^[1]。

上个世纪 50 年代,布迪厄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在阿尔及利亚所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尤其是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在我们看来,这一研究奠定了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基础,尤其是其基于此对现代社会的分析。然而,这一分析所引发的争辩至今余绪未了,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一争辩直接涉及伟大的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当然,对礼物交换的解读,并非不存在分歧。^[2] 汲喆曾指出礼物交换范式所可能具有的危险性和乌托邦性质,他亦涉及了莫斯对布迪厄的深刻影响。但更关键的在于,对礼物交换的解读,布迪厄和莫斯是完全两条不同的路径,我们或可称之为“权力范式”与“社会范式”的区别。

布迪厄受莫斯对“声誉货币”分析的启发,把人们所拥有的职业地位、文凭学历、家庭出生、社会关系都归结为“资本”的范畴,资本的运作是以象征资本的形式实现实象征权力的过程。资本的类型和数量构成了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位置,而位置则直接约制着人类的行为和习性的形成。更关键的是,布迪厄从“礼物交换模式”出发所建构的是对现代权力运作方式的人类学洞察,亦即对权力象征性运作的分析。或者说,资本只有在转换成“象征资本”后才能“正当化”,这一转换过程就是经由“礼物交换”所达致的。而“礼物交换”是在一种基本的“行为策略”的意义上进行的,这就是“象征资本”的基本内涵。进而言之,这一象征化过程之所以能够得以

[1] 王铭铭:“物的社会生命”,《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3 期;荀丽丽:“‘礼物’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6 期;汲喆:“礼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

[2] 法国学者本身亦对莫斯所代表的礼物范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认为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是认为礼物交换范式具有太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而完全忽视了市场和经济要素对生活世界的影响,因而是一种不现实的理论化;另一方面则认为礼物交换范式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易导致政治灾难。汲喆,“礼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但是,本文的研究则要指出,对莫斯所奠定的礼物交换模式还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受到了强烈的批判,那就是布迪厄所开创的礼物研究的“权力范式”。参见布迪厄:《实践感》,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一章 礼物交换：“崇高主题”还是“支配策略”？

实现，缘于社会内化于身体当中的“习性”(habitus)。基于此，布迪厄更深刻地指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科学应基于“客观化的客观化”而展开。故此，“礼物交换”被看作是一种经由时间间隔而实行的“行动策略”，与莫斯传统分道扬镳。

这两条不同的分析路径，构成了布迪厄和莫斯学派之间的激烈冲突所在，甚至于“莫斯杂志”和“莫斯通讯”就是基于对布迪厄礼物解读的批判而产生的。杂志和通讯所反对的是礼物解读当中的功利主义，以让·鲍德里亚和阿兰·卡耶为代表的莫斯的忠诚者认为，布迪厄对礼物的解读就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式的。反对者认为，这种庸俗的经济主义不啻是对莫斯传统的严重“背叛”^[1]，因而立即遭到了让·鲍德里亚和阿兰·卡耶的激烈反对。其中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对布迪厄的反对最为激烈。鲍德里亚原本准备跟布迪厄攻读博士学位，但在如何看待莫斯的“礼物交换模式”的问题上，他和布迪厄争锋相对，无法认同布迪厄从礼物交换中所牵引出来的问题。^[2]“后来，他发表了著名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论集》，提出了在使用价值(物品的使用)、交换价值(货币与商品价值)之外，还存在‘符号价值’，它不仅与一切功利主义无关，而且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比鲍德里亚对布迪厄的批判更有影响力的是阿兰·卡耶所组织的“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功利主义的运动”，“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经济学

[1] 基于此，布迪厄不得不多次站出来为自己申辩，在布迪厄的学术生涯中，很少见他会为自己的某个理论观点受到批评而进行刻意的辩护，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例外。布迪厄对莫斯礼物范式的批判来源于他上世纪50年代在阿尔及利亚所做的人类学研究，可以说，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是立基于其对莫斯礼物的批判而推进的。1994年，他不得不站出来为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说明，1997年5月15日，他则在法兰西公学举办的“莫斯的遗产”研讨会上，回顾了莫斯的研究对他的影响。汲喆：“礼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2] 这里并不意味着鲍德里亚和卡耶之间就不存在争持，鲍德里亚更为彻底地批判现代社会对莫斯所分析过的“崇高原始主题”的背弃，这种“崇高原始主题”就是对社会世界的象征行为的倚重。鲍德里亚的这一后现代取向的理论诉求，有论者将之称谓为“理论恐怖主义”。而卡耶至少还认为，礼物的交换法则并没有完全退出现代社会，虽然这一法则受到了现代社会的非人格化和抽象性、程序性的威胁。参见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与社会学教授阿兰·卡耶于1980年联络一大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历史学与哲学界的学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功利主义的运动’(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简称‘MAUSS’,即‘莫斯’),先后创办了‘莫斯通报’(Bulletin de MAUSS,至今已出了25期)和‘莫斯杂志’(Revue de MAUSS,至今已出了16期),试图通过对布迪厄经济主义的批判,恢复莫斯‘礼物交换模式’的真意,重建‘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对于这一批判狂潮,布迪厄不得不做出回应。在1992—1993年的‘法兰西学院授课’中,他再次坚持自己对莫斯礼物交换模式的理解。”^[1]由此可见,莫斯学派与布迪厄之间的分歧何其严重。

因而可以说,在有关礼物交换的解读当中,布迪厄直接与莫斯所开创的学术传统争锋相对,这亦构成了布迪厄社会理论的起点,本文试图立基于对这一“学术公案”的回顾来重新理解“礼物交换”。

二、“崇高主题”:礼物交换的社会范式

莫斯深受涂尔干的影响,但种种影响并没有局限莫斯,甚至于在涂尔干对原始宗教和分类行为的研究当中都可见莫斯的身影。而莫斯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重新解释并适当超越,其重点就在于莫斯对涂尔干所阐发的人性的二重性的再理解,它消解了在涂尔干那里成为问题的“神圣-凡俗”/“社会一个人”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再理解,在莫斯的人与物的“混融”当中得到了深刻地体现。因此,莫斯对“礼物交换”的分析,实际上构成了他回答涂尔干难题的基本线索,是对涂尔干工作的接续绵延。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礼物交换”呢?或者说如何对“礼物交换”进行理论化呢?

莫斯的问题是,“在后进社会与古代社会中,是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

[1] 马塞尔·毛斯:《社会学与人类学》,“译者的话”,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第一章 礼物交换：“崇高主题”还是“支配策略”？

规则，导致接受了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1]同时，莫斯亦强调指出他所研究的是交换的必要形式、相关的种种原则。在莫斯的意图中，对原始礼物的研究还直接指向对现代社会的思考，莫斯试图将对原始社会礼物的考察扩展到现代社会，亦即试图基于道德的维度来重构现代社会的逻辑，重构现代社会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的逻辑。“礼物、礼物中的自由与义务、慷慨施舍以及给予将会带来利益等等主题，作为一种久被遗忘了的支配性动机的再现，又重新回到我们当中”，“只要社会、社会中的次群体以至社会中的个体，能够使他们的关系稳定下来，知道给予、接受和回报，社会就能进步”。^[2]

回到莫斯的问题，为什么有回礼的义务呢？又如何理解这种义务？关键在于，在交换流通中，礼物超越其实物本质，而具有社会生命、具有社会人格。“总之，归根到底便是混融。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期间本来已经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这就是契约与交换。”^[3]在这一过程当中，事物具有了人格，而这些人格又成为氏族的某种永久性的事物。他们将财产和财富都予以神圣化了。虽然在夸富宴中，追求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一利益逻辑却实实在在存在；但是，追求财富本身却不是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荣誉和声望等等。^[4] 莫斯分析道，“人们之所以要送礼、回礼，是为了相互致以和报以‘尊敬’(des respects)——正如我们如今所谓的‘礼节’(des politesses)。但是，在给予别人礼物的同时，也就是把自己给了

[1] 马塞尔·莫斯：《礼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 页。

[2] 同上，第 209 页。

[3] 同上，第 41 页。

[4] 对财产和财富的神圣化，是否与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某种关联呢？如果礼物交换是为了获致声望与荣誉而非利益本身，那么，这就与韦伯的分析有某种契合了。在资本主义精神中，虽然追求财富就是目的本身，但这又构成为一种手段：救赎的手段。区别在于，莫斯这里的荣誉和声望，在韦伯这里便是救赎了。但是，反过来，声望与荣誉又何尝不是救赎呢？

布迪厄的终生问题

别人；之所以把自己也给出去，是因为所欠于别人的正是他自己——他本身与他的财物”。^[1]

这种荣誉原则^[2]，也就是一种经济、社会、法律与道德的“混融”，换言之，对礼物的“所有权”经由这种“混融”而具有了特定的涵义，这在马林诺夫斯基所描述的“库拉圈”中得到了具体而详尽的体现。莫斯分析道：“因此，人们固然对所收到的礼物有一种所有权，但却是一种特殊的所有权。或许可以说，这种所有权含有我们的各种权利原则的特性，尽管我们这些现代人与之天悬地隔。它既是所有权也是所有物，即是抵押品也是租借物，即是出售物也是购得物，同时还是寄存物、托管物和受托须转交给第三者的物品：因为给你的条件就是要让别人来使用它，要转交给第三者，即所谓‘murimuri’（远方的伙伴）。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发现、观察和描述的经济、法律和道德的复合（complexus），的确十分典型。”^[3]是荣誉原则，是在实践活动当中的身体和心智感受导致了对礼物交换的参与。

基于荣誉原则而产生的相互义务感，将所有人都整合在一起、“混融”在一起，彼此难以分离。“通过对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的部分民族的考察，我们已经勾勒出了这种赠礼制度的确凿形象。那里的物质生活、道德生活和交换，是以一种无关利害的义务的形式发生、进行的。同时，这

[1] 马塞尔·莫斯：《礼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1 页。

[2] 我们当然知道这里存在着几乎是无法消解的难题，也即帕斯卡尔所谓的，人类最基础性的追求乃是对荣耀的追求。这也是人之优秀的最显著性的符号；因为，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多少物质财富、拥有健康和舒适，倘若你没有被人敬仰，你就不会感到满意。这个帕斯卡尔式的命题，在布迪厄那里则构成为象征暴力的原始基础，也成为需要反思的核心对象，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难题。Bourdieu, Pierre 2000, *Pascalian Mediations*,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166。布迪厄自己也认为，行动的价值并不表现为它指向一个经济目标，而是行动本身，它无视它的经济功能，而仅仅关注于它的社会功能。所以，我们能够知道，自我尊重(self-respecting)的人必定会一直忙于做些事情，而不是无所事事。但是，莫斯学派的人会认为布迪厄实际上还是偏离了这一预想。Bourdieu, Pierre 1979, *Algeria 1960*. trans.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4。

[3] 马塞尔·莫斯：《礼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 页。